

汪幸福著

纪实文学

首次披露鲜为人知的大冤情

台湾九大案纪实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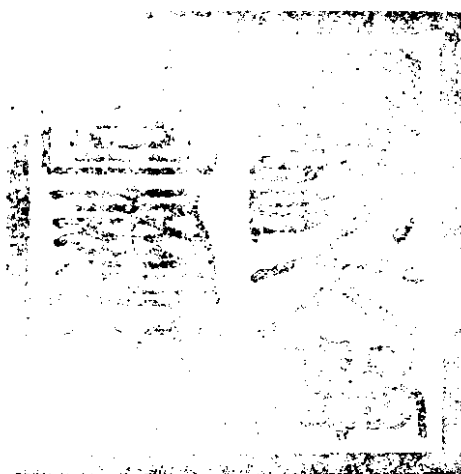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0150 0

台湾九大案纪实

汪幸福 著

GF11/0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北京

(京) 新登字 097 号

台湾九大案纪实

汪幸福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5 印张 358 (千) 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1.00 元

ISBN 7-5043-2538-4/I · 309

内容简介

这是台湾当局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期间，用阴谋毒辣、花样翻新的卑劣手段迫害不同政见者和无辜人士的大纪实。书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冤情是首次在大陆披露：蒋介石、蒋经国阴谋用车祸杀害原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不成，又指使胡适在美国大肆丑化、攻击吴；一次又一次用重金收买打手陷害前“政务委员”雷震；秘设圈套钓著名思想家殷海光；用“约谈”活活打死旅美博士陈文成；暗布“匪谍”害著名党外人士余登发入狱；悬巨额奖金追捕《美丽岛》人士施明德；三番两次派大批军警到高雄搜山、掘土，打击宗教人士谈昭兴等。作者用优美、生动、形象和耐人寻味的语言，抽丝剥茧的手法，将一件件、一桩桩冤案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情节曲折、生动、传奇，可读性强。

前 言

我写完长篇小说《浪迹台湾岛》和几部中篇纪实文学后，曾计划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再写一部反映台湾老兵生活的小说。由于工作太忙和一些报刊编辑时常约稿耽误时间，致使这部小说没有写成。

恰在这时，我在港台和美国的朋友们陆续给我寄来了供我写殷海光传记《战犯·斗士·笼中鸟》的参考资料。这些极珍贵的报刊、书籍，如《雷震回忆录》、《殷海光全集》、《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李敖自传与回忆》、《国民党研究》、《蒋介石研究》、《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等，披露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台湾数十年间，制造的许多冤案内幕。看完这些资料后，我决定把小说和殷海光传记暂放一下，先写一本披露台湾黑暗政治及冤狱的纪实文学，让大陆人民看看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如何迫害异己的，台湾到底有没有自由、民主。

这本书从一九九〇年五月动笔，一九九二年六月底脱稿，历时两年多（主要是业余时间）。现在，这本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为使广大读者看好这本书，有几点需在这里作一说明：

第一，案例的选择问题。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主政台湾期间，制造的冤案难以计数。我选择的这九例案子，时间跨越近

四十年，都是台湾五十至八十年代爆发的震惊中外的有代表性的大事件，影响不大的冤案未选取。殷海光对大陆人来说，有些陌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蒋氏父子把殷海光放在雷震之后进行迫害，当时海峡正在对峙，大陆报刊未报道这一情况；二是国民党当局迫害殷海光时，主要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而且迫害的时间拉得很长，外界大多不知详情，史料披露较晚。我之所以要对这件案子重写，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殷海光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抗争言论的旗手，“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民主斗士”、“思想大师”和著名学者。他的理论、思想、文章，影响了台湾几代青年。同时，他又是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士。另一方面，殷海光是《自由中国》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了《自由中国》的方向，雷震的思想也深受他的影响。《自由中国》杂志上对读者影响最大、对国民党政权抨击最厉害的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后来，《自由中国》以言获罪，也主要是他的文章造成。由于雷震是《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加之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文章，有不少是以社论和评论的形式出现，未署个人名字，故后来大陆一些学者在叙述《自由中国》事件时，多提到雷震，忽略了殷海光。这是很不公允的。基于上述原因，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殷案备忘录》。

《自由中国》事件的内情和余登发冤案，人们知道得很少，八十年代的锡安山案，大陆同胞恐怕还未听说过，我用较重的笔墨将这些事件的内幕写出来，相信读者会感到新鲜、有趣。

孙立人事件和江南命案本应写进书中。考虑到近几年来大陆报刊上写这两个事件的文章和著作较多，特别是江南命案，上海《文汇报》曾连载过反映这一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大陆读者已经很了解这两个案件的详细经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写了。尽管少了这两个大事件，我认为不会影响这本《台湾九大案纪

实》的质量。

第二，书中的人物问题。这部纪实文学中的少数人物是比较复杂的，如大家熟悉的许信良、姚嘉文等。特别是许信良，他曾是七十年代台湾岛上反抗国民党特务统治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逃到美国。在美期间，他参与了“台独”活动，发表了一些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言论，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批评。后来，他虽然认过错，但人民还是难以谅解他。去年，他出任台湾民进党主席，又有“台独”倾向，再次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批评。这是他的悲剧。

尽管许信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我又认为，他在中坻事件及余登发事件期间那一段抗争历史还是应该肯定的，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中坻事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要写这个事件，又非涉及许信良不可。我写他，旨在叙述、反映那个反抗国民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象目前大陆出版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著作，电影《大决战》写林彪一样，不是歌颂他，而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如雷震、殷海光，他们二人在《自由中国》时代曾风光八面，声名赫赫。遗憾的是，他们在大力反蒋的同时，又积极反共，他们的有些理论、主张，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相信读者阅读此书时，会深明此理。

第三，此书的事实问题。这部书的事实大多取自港台报刊、资料书籍，事实均有根据。我在创作这部纪实文学时，参看过蒋介石、蒋经国、胡适、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殷夏君璐、李敖、殷文丽、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江南、陈鼓应、黄顺兴、聂华苓、陈平景、林毓生、胡虚一、卢苍、黄怡、徐高阮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对极少数捉不准的问题，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了甄别。由于海峡之隔，有的事件年代较久，加之资料有限，书中难免有失当或不妥的地方。希望了解书中内

幕的台胞看到此书后，能指出存在的问题。

据我所知，在大陆定居的台胞中，有些人参与了书中事件的活动，如黄顺兴、张春男、陈鼓应先生。特别是陈鼓应先生，他在台湾组织、参与过多次政治大事件的活动，知道很多的内幕。因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无法取得联系，希望他看到这本书后，能给我一些帮助。

第四，书名与内容的问题。这本书的个别篇目，如《中坜选举战纪实》，与书名有些不符。这是因为，我这本书初名为《台湾黑幕录》，由于种种原因，寄给出版社时又临时改名为《台湾九大案纪实》。我曾考虑将《中坜选举战纪实》一稿抽出来，后来朋友们一再建议我不要抽。他们说，这篇的可读性很强，留在里面既可调节读者口味，又可使读者多了解一点台湾社会、政情。还有的朋友说，这是纪实文学，与有的作家的散文、小说集由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书名是一样的，没有必要抽。我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些道理，故没有将这一篇抽出来。

这部纪实文学的出版，是许多领导、同事朋友们鼎力相助的结果。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居住在美国加州的殷海光夫人殷夏君璐女士和台湾的陈宏正先生。他们为了支持我写作，不惜资金、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给我寄来了一包又一包资料，使我顺利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广州海关、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也给我以很大的支持。中共中央统战部离休老干部廖希圣、张淑惠夫妇，台湾政治大学梁中英教授，黄州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王林坤及其他负责同志，我的同事陈楚顺、汪斌等，也曾给我诸多帮助和方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责任编辑萧歌和总编室副主任罗林平同志，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作 者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



50年代任台湾“国防部”
政治部主任时的蒋经国。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在台北阳明山。



胡 适



这是1958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照。中排左四为胡适；后排左六为雷震，左八为殷海光，左五为夏道平；中排左三为聂华苓，前排左二为傅正。

目 录

第一篇	吴蒋反目内幕·····	(1)
第二篇	台岛奇冤 ——台湾“五·二四”事件 纪实·····	(46)
第三篇	台岛文字狱·····	(81)
第四篇	殷案备忘录·····	(165)
第五篇	中坜选举战纪实·····	(285)
第六篇	余登发冤狱记·····	(318)
第七篇	《美丽岛》事件的 前前后后·····	(347)
第八篇	陈文成血案真相·····	(390)
第九篇	锡安山事件始末·····	(424)

〔第一篇〕

吴蒋反目内幕

一

一九〇三年十月，吴国桢出生在湖北建始县凉水埠。五岁随父吴经明在北京模范小学读书，九岁入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一九二〇年到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格林内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吴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吴国桢学成回国后，在国民党元老重臣张群、宋子文、宋美龄的提携下，历任江苏交涉公署科长、国民党外交部副司长、湖北烟酒事务局局长、南京军委会侍从室秘书、汉口特别市财政局长、省政府委员、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市长。一九四九年春逃到台湾，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是四五十年代国民党政坛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吴国桢与蒋家的矛盾源于四十年代末。

一九四六年五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长。吴国桢为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在任内使出了浑身解数。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蒋政权元气已尽，他无力回天，上海面貌依然如旧。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借“币制改革”之机，用金圆券大刮民脂民膏，使得上海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蒋介石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局面，特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任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一到上海，仗着老蒋的权势，不顾实际，盲目打击、制裁投机商人，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吴国桢认为国民党经济崩溃的原因很多，反对蒋经国光打击商人的一套做法。两人彼此发生冲突。最后，蒋经国“打老虎”的政策失败，愤然离开上海。蒋经国认为自己的失败是以吴国桢为首的上海市政府不合作造成的，开始对吴耿耿于怀。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控制特务系统。仗着父亲的权势，蒋经国打着“保密防谍”的旗号，滥杀无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身为省主席、又受过美式教育的吴国桢极力主张“民主”、“法制”，对蒋经国随意越权指挥特务抓人，又不照“法律”程序处理案件的做法极为不满。

为这，两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

一九五〇年二月。

台湾省政府会议室。

吴国桢主持召开的“资源普查”会议还未开始，省政府一官员匆匆走进来向吴国桢报告说：

“吴主席，火柴公司经理王哲甫被抓了。”

吴国桢大吃一惊：“你听谁说的？”

“公司派人来反映的。”

“何因被抓呢？”

“听说他有共产党嫌疑。”

吴国桢一听说王哲甫与共产党有关系，越发感到可疑。他心想：台湾火柴公司先前设在上海，原董事长吴性裁是电影界的知名人士，国民党失败后，吴性裁留在大陆未出来，搬到台湾的火柴公司则由王哲甫继任经理。王系企业界人士，与政治无任何瓜葛，怎么扯得上是共产党呢？不用说，这又是情治系统制造的一大冤案。别的错案今天不说，王哲甫的情况我一清二楚，这回一定要与他们搞个明白，以此来制止他们的违法乱纪活动。

吴国桢又问来报告情况的官员：

“你知道是哪个单位抓的吗？”

“保安司令部。”

吴国桢听说是保安司令部抓的，自己这个“司令”却不知道，心中更有气了，他对来报告情况的官员说：“你马上给彭孟缉副司令打个电话，叫他立即到我这里来一下，并将王哲甫的案卷一起带来。”

“是。”报告情况的官员马上退了出去。

吴国桢开完会后，彭孟缉夹着王哲甫的案卷驱车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此时，吴国桢正在批阅公文。彭孟缉走进室内，连招呼也不打，将王哲甫的案卷丢到吴国桢的面前说：

“你要的卷宗送来了！”

吴国桢观人看物入木三分。他从彭孟缉的面部表情，看出了彭孟缉有很大的情绪。他吩咐秘书给彭孟缉倒了一杯水后，便一页页地翻阅王哲甫的案卷。

彭孟缉冷眼望着吴国桢，心里想：你看得那么认真有什么用？蒋经国主任叫我抓的，你反对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狗要侍主，臣要忠君。我是总裁一手提拔起来的，要知遇报恩，一切听从太子指挥。我心中只有蒋经国，绝对不会有你吴国桢，更不会买你的帐。

吴国桢看完卷宗，摘下眼镜对彭孟缉说：

“不哲甫不能抓。”

“怎么不能抓呢？”

“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

“嗯。”

彭孟缉不服地说：“台湾火柴公司虽然是从上海搬来的，董事长还是吴性栽。这个家伙看到共产党得了势，急急忙忙掉屁股依附共党政权，在很短的时间里拍摄了一部丑化总裁和‘中华民国’的反动影片《民国四十年》，并在香港大肆宣传，造成极坏影响。王哲甫虽然到台湾来了，却与吴性栽藕断丝连，勾勾搭搭，几次到香港去拜会吴性栽。这样敌我不分的坏家伙不抓怎么行？”

吴国桢见彭孟缉无理强辩，连忙问道：“王哲甫两次到香港是什么时候？”

“这……”彭孟缉答不上来。

“吴性栽拍《民国四十年》是什么时间？”

“我不太……”彭孟缉脸红了。

吴国桢乘机教训他说：“王哲甫两次到香港，都是在吴性栽拍《民国四十年》之前，而且他们之间的接触又多是谈的业务方面的事情。我认为，你们以‘勾结共党’的罪名抓他，不但于法无据，站不住脚，且无法说服广大民众。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不顾事实，光凭感情用事呢？”

“人已抓了，那怎么……？”

“赶快放掉！”

彭孟缉见吴国桢开口要将王哲甫放掉，便不服气地盯着吴国桢，心想：蒋经国叫抓的人，你叫放掉，好大的胆子！他心里这样想，口里却不好说出来。因为，吴国桢毕竟是正司令，他

是副司令。于是，他望着吴国桢，迟迟不表态。

“马上将王哲甫放出去！”吴国桢又大声命令道。

彭孟缉见吴国桢一再逼他放人，觉得硬顶不好，说：“吴主席（他从不称吴国桢为司令，他觉得司令应是他自己），放王哲甫我没有意见，不过要你下个手令。”

“我下！”

敢说敢做的吴国桢立即抽出笔和纸，给彭孟缉写了“立即释放王哲甫”七个字。

彭孟缉拿着吴国桢的手令低头走了出来。他边走边自言自语道：“你吴国桢虽然下了手令，也算不得数，我还得去请示经国主任。只有经国主任说放，我才放人。”

当天下午，彭孟缉赶到“国防部”政治部办公室，向蒋经国报告吴国桢下令释放王哲甫一事。

蒋经国一听，皱着眉头问：“这是一个典型的附‘匪’案，他为什么要下令释放？”

“他说证据不足。”

“胡说！”蒋经国拍着桌子吼道，“这是什么时候？件件案子要三证俱全，依法办事，能抓住狡猾的共谍吗？！”

彭孟缉连忙附和道：“我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跟他讲的，他不但不听，反而还下手令逼我马上放人。”

蒋经国听说吴国桢下了手令，连忙问：“他的手令呢？”

“在我这里。”彭孟缉边说边在衣袋里掏。

蒋经国看完“手令”，更加火了：“他吴国桢在政府岗位上负重要职责二十余年，对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人却这般信任、宽容，他的思想意识有问题！”

“他的手令执不执行呢？”

“不执行！”

“他是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不听他的那怎么……”

蒋经国仔细一想，认为彭孟缉处理此事确有难处。他想在吴国桢面前摆一下太子的威风，又怕把关系弄僵不好办。想了一会儿，他对彭孟缉说：“走，我俩一起到省政府去一趟，当面与吴说说。”

“那好，这就使我不为难了。”

下午五点，蒋经国与彭孟缉一起来到吴国桢办公室。

吴国桢见蒋孟两人同时来找，而且脸色都不好，知道他们是为王哲甫案来的。他很客气地招呼对方坐下后，带着试探的口气，向蒋经国问道：

“二位来有何事？”

蒋经国指着彭孟缉说：“我刚才听他说，你不同意抓王哲甫，他感到很为难。我想把这事向你说明一下。”

“你说吧。”

蒋经国将抓王哲甫的理由说了一遍。然后说：“这个人放不得，不然，后患无穷。”

吴国桢不满地瞥了蒋经国一眼说：“他是个纯商人，过去未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没有获得很硬的证据的情况下，你们以他到香港会见过两次吴性裁为由将他抓进监狱，于理于法说不过去。弄不好，这起案子将来会弄得保安司令部下不了台，省政府也不好看。”

“吴性裁现在是共产党的人了，他与吴性裁关系密切，这不是罪证？”

吴国桢对蒋经国的这种胡扯乱拉的做法很反感，沉着脸说：“抓人判刑的事，要重事依法，怎么能用类推的办法呢？如按你这种推法，我看在台湾可抓五六十万人！”

蒋经国哑了，神态也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阵，蒋经国起身并用很重的语气说：“王哲甫罪迹明显，不能释放！”